

#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分析 “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

□刘明越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 上海 200433)

**摘要:**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运用传统的政治资源——政治动员方式,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以这种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增长, 并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大跃进”政治动员产生了积极效果和负面效果。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科学地分析政治动员, 还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关键词:** 大跃进; 政治动员; 效果;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2) 07-0121-04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政治手段, 是实现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 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一时期, 党和政府面临着在继承传统的执政资源和政治资源基础之上, 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如何运用政治动员方式成为我党在新时期治国和治党, 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和社会全面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 一、政治动员的涵义和基本要求

徐彬认为政治动员的涵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 从政治动员的实施过程和行为本身来界定, 强调动员的动态特点; 从政治动员所能达到的功能进行界定, 强调动员对客体参与政治动员积极性和能动性的激发, 以实现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支持; 从国防战争的角度对政治动员概念进行界定, 把政治动员纳入国防战争的研究范围, 强调军队精神的作用。<sup>[1]</sup> 李斌认为政治动员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 动员主体以宣传劝导的方式, 辅以物质刺激和其他手段, 引导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的权威及其价值主张, 并在动员客体间构建人际联系网络, 促使其展开主体特定的群体行为, 实现动员主体设定的各项目标。<sup>[2]</sup> 美国学者汤森和沃马克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对政治动员进行界定, 政治动员是为获取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 完成这一任务的首要途径是一系列的群众运动, 每一次运动都会有双重目的, 即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同时在中共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sup>[3]</sup> 政治动员可以利用政治资源和所能达到的功能的维度来界定, 政治动员主体凭

借其政治权力和地位, 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利用动员客体的规模优势和群集效应开发政治资源, 达到政治动员的目标, 实现动员主体和客体的经济利益的群众运动。

政治动员包括政治动员主体、客体、政治动员目标、政治动员手段(途径)。政治动员的主体分为两个层次, 一类是体制化层面的政治动员主体, 主要是政府、政党以及其他政治团体或社团; 另一类是人格化层面的政治动员主体, 主要是指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以及其他政治或社团群体。<sup>[4]</sup> 我国政党与国家的逻辑关系(即政党是国家的前提)和中国革命的实践,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政治动员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政治动员的客体, 即政治动员的参与者和受众主体。政治动员目标是政治动员主体根据政治动员主体的政治价值观, 为了实现动员主体和客体利益而制定的政治、经济等长期或短期的政治动员任务。

政治动员包括政治教育、群众运动、典型示范、组织控制、舆论宣传、强制性参与、暴力革命等途径。政治动员手段集中反映了政治动员主体的政治核心价值观。政治动员目标能否实现和实现程度取决于政治动员主体资质、动员领域和实现途径或手段的合理性。中国政治动员的手段可以概括为规范性的政治动员、制约性的政治动员和诱致性的政治动员。<sup>[5]</sup> 中国政治动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划分, 可以分为强制性政治动员和诱致性政治动员两种类型。强制性政治动员是指政治动员主体以强制力或命令推动而实现的政治动员。诱致性政治动员是为响应获利机会而推动和实现的政治动员, 是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旧的束缚的瓦解, 以及人们逐渐适应于新方式的社会化和行为的过程。<sup>[6]</sup>

## 二、“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模式分析

[收稿日期] 2012-02-22

[作者简介] 刘明越(1980-), 男, 蒙古族, 内蒙古海拉尔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2010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 法学硕士。

从“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主体特征、手段、目标内容来分析，“大跃进”政治动员属于强制性政治动员。“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是党和政府，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群众运动、法律条文、物质激励等政治动员手段全面地动员社会主义建设者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借助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意志来克服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资源限制和技术限制，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在短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并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补足或部分代替功能缺失的科层管理制度。

“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主体和客体。“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执政党能够成功地发动政治动员，必须得到政治动员的客体对政党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所以“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客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在“反右倾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产生了偏差，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动员的资格被弱化。因此，在“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过程中广大工人和农民是政治动员的主要参与者。

“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模式。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实现政治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大跃进”运动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群众运动、组织控制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灌输政治意识，整合社会资源和组织资源，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动员以达到政治动员的效果。党和政府还把关于政府动员的一些重大决定以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为政治动员提供政治保证和法律基础。“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目标是党和政府通过整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周期内付出超常的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跨越式的发展，完成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目标的实现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通过组织和努力，就能把他们的劳动转化为资本。<sup>[7]</sup>

“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的特性。“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实质上是延安精神的延续，即革命的政治动员、群众路线、“政治挂帅”，运用组织和意志力来实现技术上“不可能”的目标。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不去追溯制度的渐进性演化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今日的选择。<sup>[8]</sup>组织和制度的交互作用容易产生出某种组织和某种特定的制度共生的“锁入效应”，这种效应往往导致一种或某种低效率制度的自我维系机制。在中国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事业中，中国社会的许多团体已经开始使用政治动员，坚信动员和斗争是政治本质。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具有很高的价值。<sup>[9]</sup>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sup>[10]</sup>政治动员是将群众路线的原则神圣化，认为人的努力和意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大众动员是解决所有行动领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sup>[11]</sup>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同样认为，“大跃进”的发动存在对政治动员的路径依赖，尤其是政治精英对政治动员的依赖。产生“大跃进”策略的动力是来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的非常深远的思潮。从前，革命

一旦面临似乎是难以应付的成败关头时，一批创造性的以广泛动员各种力量为核心的军事和政治的政策保住了胜利。在“大跃进”发动前夕，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精英开始注意延安精神（及其方法，把它作为他们的希望的源泉。<sup>[12]</sup>党的政治精英和党的基层干部对通过政治动员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和工作方法耳熟能详，继而党的政治精英对政治动员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 三、“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效果及失败原因分析

#### 1. “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效果

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政治动员可以部分代替代议民主制的功能，用于支持特定主体的动员性政治参与，回应和满足民众的相关政治要求。<sup>[13]</sup>而政治动员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动员内容能否被动员对象所接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动员对象所接受。“大跃进”政治动员既产生了积极效果又产生了负面效果。首先，“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使执政党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以意识形态教育和群众运动方式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使广大群众正确认识、理解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了政党执政的基础。其次，“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提高了广大政治动员客体的参政意识，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利益要求的机会，激发和调动了政治动员客体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价值诉求，提升了民众实现国富民强的动力。相对于积极效果，“大跃进”政治动员的负面效应是不可估量的。首先，“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缺少人本精神，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诉求。因此，在运动期间，动员客体自发地产生了一种抑制不利于自己的计划行为，产生了“集体搭便车”的行为。其次，政治动员过于依赖党和政府权威，实行服从式的权力化代替科学化的管理方式，政府调节和管理经济的职能被弱化。“大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序列混乱，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在动员过程中还忽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造成了资金、物力和人力的极大浪费。第三，“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由于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排斥持不同政见者，从而使党的民主集中制不能发挥作用。在“大跃进”运动中集中表现为对反对冒进的多次批判以及把反对冒进上升为政治问题。自从把反冒进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以来，党内的不同意见难以提出了，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sup>[14]</sup>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结果就是在党内滋生了个人崇拜，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逐渐失去了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第四，政治动员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大跃进”政治动员本身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很多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依据，破坏了正式制度对社会运行的维护作用。运动期间地方政府和党的基层组织不能完全地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导致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缺少稳定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也伴随着这些不稳定政策而摇摆不定。第五，权力人格化破坏了政治精英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使当时的经济建设缺少智力支持和科学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缺少

持续的动力。

## 2. “大跃进”运动失败原因分析

### ① 国家目标的实现与政治动员

社会革命是政治、经济、社会整体性的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并不是因为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而停止或延缓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而是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动员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技术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建国后，国家的发展目标已经逐渐变为综合性的发展目标，因此，政治动员只能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而不能代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主要是指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还有具体的章程、个人契约。其中，政治规则广泛地界定了政治的科层结构，包括其基本的决策结构、日常程序控制的外部特征。<sup>〔15〕</sup>正式规则有界定政党和政府权力的边界、责任和目标的功能，而过于依赖政治动员的后果就是削弱正式规则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约束作用，以及对政党权力边界的限制功能，进而使政党制定国家目标不能完全按照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来实现，出现政策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的现象。由于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实现国家目标。

### ② 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政治动员

20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秘密报告和波匈事件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造成了不利影响，资本主义阵营也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严重威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党的领导集体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跃进式”发展才能巩固新生政权，才能避免再次落后挨打，避免重蹈波匈事件的覆辙。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的目标。但由于综合国力不强，中国实现富强的理想还未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必须尽早改变综合国力落后的现状。虽然“一五”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而建国初期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多是效仿苏联模式的结果。鉴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因此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就不能完全模仿苏联模式。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协调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模式，因此党和政府具有探索本国发展模式需要的内在动力。党和政府坚信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才能举全国之力实现中国经济的跃进式发展，最终达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目。

### ③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意识与政治动员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行使执政权力、履行执政职能、完成执政使命的能力和水平。<sup>〔16〕</sup>执政意识是在一定的国家与社会条件下，执政党（包括其组织成员）对执政党的性质与地位、权利与职责、执政目标与实现方式、执政目的与价值追求、执政条件与执政环境的全面而整体的认识与看法。<sup>〔17〕</sup>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意识紧密联系，互为作用。执政能力决定执政意识，而执政意识又影响执政能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国家体系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成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具有合法性。党在公共政策和政治生活中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直接

关系到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所以党利用政治动员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直接关乎实现程度和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其执政角色也就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革命党”和“执政党”在执政思维、工作任务、党的建设方式、领导方式上都大不相同。在执政思维上，革命时期的政党是以夺取政权为核心任务的；而执政时期的政党是围绕着如何巩固和建设政权展开的，整合社会资源建设国家。在工作任务上，革命时期的政党面临阶级斗争的任务；而执政时期的政党面临发展生产力，重构生产关系的任务。在党的建设方式上，作为革命政党需要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发动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而作为执政党则需要以政党规范为基准建设政党体系。在领导方式上，作为革命政党更多的是采用直接领导的方式，集中多于民主；而作为执政党更多的是采用间接的领导，通过政府、法律管理社会，民主多于集中。“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需要完成“执政意识”的转变。只有执政党转变执政意识，才能相应地转变职能，树立正确的执政意识，按照执政规律办事，合理地利用政治资源。执政意识决定了政党继承和使用传统的政治资源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其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要求党的执政职能也要适时地转变。党以“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方式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党执政能力不完善的集中表现，是“执政意识”的转变相对滞后产生的结果。建国之初，党的执政能力不能适时转变和党自身建设不完善，在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上没有充分发挥党的民主机制和民主程序。

### ④ 政治领袖与政治动员

毛泽东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在“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上发挥了主要作用。毛泽东认为工农阶级具有潜在的动员潜力，通过政治动员可以实现政治目标。“在“大跃进”运动的动员过程中，毛泽东坚决坚持冒进，批评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认为，许多同志有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当他们转向领导经济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如果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经济建设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sup>〔18〕</sup>毛泽东的号召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其个人的观点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居于重要地位。毛泽东在“大跃进”政治动员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批评反冒进”、“超英赶美”、“一穷二白”、“插红旗”、“拔白旗”、“敢于破除迷信”等一系列推进“大跃进”政治动员的重大决策上。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用政治动员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阶级矛盾”以及经济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管理和社会稳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政治动员的路径依赖与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意识、以及与发展道路的选择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我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发生的内在动力。党的执政职能转变滞后、执政意识滞后，以及政治精英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党对政治动员特殊权力技术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 四、“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的经验启示

### 1. 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符合国情

用政治动员方式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建国初期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尝试。用这种方式发展经济推进国家建设速度，不但没有实现“跃进”式的发展，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党和国家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必须符合国情，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跨越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人们可以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用运动的方式可以一时激起群众的热情，但搞建设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sup>[19]</sup>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已经涉及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因此，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尝试，必须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将社会变革的现实情况纳入发展模式当中。“大跃进”运动政治动员只有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将精神激励和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利用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配置的较好效果。

## 2. 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对促进一国的制度变迁、政治制度的建设和政治文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种整体的视角，它为人们提供特定的价值判断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具有激励、阐释、辩护、批判的功能。意识形态是政党执政的基础性和稳定性的执政资源，是政党宣传政治主张、灌输政治意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整合社会资源和实现社会稳定的手段。群众运动是政党执政的社会资源和组织资源。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后，便上升为具有统领地位的国家意志，是整合国家成员的重要手段。政治动员具有改变动员客体旧政治文化心理和被动接受政治生活的功能，此项功能可以用来从意识形态层面引导民众对新生国家和政党的支持，巩固新生国家和政党的合法政治地位。思维革命化是长期政治动员的产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殊性导致革命的意识形态逐渐转为政治动员客体对社会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并成为政治动员主客体双方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他们的政治选择和行为。<sup>[20]</sup>在政治动员中，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会促使政治动员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催化剂。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需要保持政党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意识形态进行适度的调整。此外，还需要实现意识形态资源与民众利益相结合。民众对于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执政党通过自身的意识形态来反映人们的利益、需求和愿望。<sup>[21]</sup>

## 3. 完善党的执政能力，转变执政意识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现代化国家的实现。由于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存在着“协商缺位，监督不力”的问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对于刚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政党而言，转变执政意识至关重要，也是提升执政能力的前提条件。我党在转变“执政地位”的同时必须转变“执政意识”，需要从长期

的革命思维的惯性中走出来，适应时代的新要求。执政党意识的转化与提升必须从一般政党意识向作为国家公共权力掌控者的全局意识与整体意识提升。提升执政能力最重要的是加强和完善政党制度建设，提高党驾驭社会经济建设的的能力，使党的重大经济决策符合国情和民意，符合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提高对重大战略决策的监督作用。我党有效行使执政权力、履行执政职能必须发展人民民主，发挥人民参政议政的作用，提升人民参政议政的能力。

## 4. 建设民主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主要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先进性示范作用等非权力领导方式来实现党的领导。建设民主型政党就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建设民主型政党关键在于完善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意在增强党的活力、提高党的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以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如何理顺权力来源，使政党内部有序运转起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完善党内民主，有助于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可以防止政党领袖一言堂格局的出现，防止形成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充分发挥党内领导集体的智慧和经验。完善党内民主必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形成健全的党内监督体制。完善党内民主还取决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程度。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有益于增强党的执政权威。■

参考文献：

- [1] [4] [5] [6] 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 [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33、34、35、39、180、263、285.
- [2] 李斌.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 [J].南京社会科学：2009（10）：71—76.
- [3] [9] [10] [11] 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7、56、57、82.
- [7] [美]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
- [8] [15] [美]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39、65.
- [12] [美]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兴起1949—1965年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2.
- [13] 李斌.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J].浙江社会科学：2010（4）：33—39.
- [14] [18]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308、309.
- [16] [17] 刘红凛.协同与共赢——论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与执政能力建设 [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69、73.
- [19] 罗平汉.“大跃进”的发动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20] 左玉珍，徐彬.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绩效及其评估——基于“1921—1966”的中国政治发展视角 [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88—94.
- [21] 蒯正明，杨新宇.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研究 [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12.

责任编辑：余 弓